

司马迁和他的西方同行:论几种可能的描述范式*

F. -H. 穆奇勒 (F. -H. Mutschler)

【提要】 本文主要从古代历史学的角度对黄俊杰教授论文中的一些观点进行评论。本文主要涉及在几种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历史重要性问题:即历史思维和历史学提供的导向类型;历史论证中的具体实例和抽象规律之间的关系。通过考察古希腊和罗马之间的不同,人们会发现,黄教授指出东西方之间存在或明或暗的对立的观点,对古希腊是适用的,但对古罗马而言则并非如此。

黄教授在文章中认为,中国历史思维的特点是通过时间呈现自身。然而,他的表述在某些方面是偏重于古代而言的。作者在文章中引用最多的历史学家是中国的历史学之父司马迁。显然,黄教授认为,在历史思维中,“古典作品”也行使了一种规范和形成功能。尽管一个重要观点认为,西方世界即使不是在近代早期也是在中世纪才成为一个与众不同的单位,但作为一名古典学者,我同意黄教授的观点。因此,我将从一名古典学者的角度,考察他对中国历史思维特殊性的描述,并以古代为中心,针对黄教授文章中的三点做出回应。

第一点是有关历史在中国文化中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的问题。黄教授写道:“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下,人的生活就是被历史来定位”(第181页)^①;“在中国传统中,历史观念就是生活的经线和纬线”(第185页);“中国就是我们最清楚地看到人是彻头彻尾的历史人的地方”(第186页)。正如吕森教授在评论文章中所说,黄教授不赞同西方这个典范性的“他者”的观点很有刺激性,西方“历史思维的现代方式”是启蒙运动晚期的思想产物,而且在历史相对论中,它“已经成了处理历史的主导方式,起码在学术话语层面上是这样的”(第189—190页)。然而,事实到底如何,让我们看看,黄教授声称历史具有作为中国文化导向力的独特重要性的观点,在中西古代的比较中是否能够找到有力证据。

对古希腊来说,黄教授的观点似乎被证明是正确的。相较于中国古代而言,历史思维和历史学在古希腊没有行使生命导向功能。在中国,正所谓“六经皆史”(章学诚)。反之,

* 本文原刊于《历史与理论》(*History and Theory*)第46卷,第2期(2007年5月)。本刊转载时略有调整。

① 有关页码,见黄俊杰:《对中国历史思维的阐释》和约翰·吕森:《跨越文化的界限》,《历史与理论》46(2007)。相关页码将在括号中列出。

希腊文学最初(公元前8世纪)是虚构的史诗和教诲诗:史诗的主题是神话故事,如由众英雄领导的、奥林匹斯诸神关注和影响的特洛伊战争;教诲诗的主题是神谱和农业历法。随后在公元前7世纪抒情诗产生,一两个世纪以后(大约公元前500年)戏剧诗形成,但是在这两种文学形式中,历史都并非重要题材。同时期发展起来的哲学,最初主要关注的是物质世界的本质,公元前5世纪中期以后,它才“从天上来到人间”。历史学大约就是在这时期才开始形成,但是在希腊的文学生活中,它从来没有扮演过特别重要的角色。

但希腊只是古代西方世界的一部分。有关另外一部分,罗马的情况则与之相差悬殊。在我们了解古代传统(*mos maiorum*)这一概念及其在罗马的重要性以后,这种不同立即清晰可见。“古代传统”概念是和社会和政治生活的指导性原则;在私下的和公共的行为方面,它使罗马人整体上从先辈那里继承了一种保守导向。如果一个人以父辈的方式为自己的生活导向,那他就必须对它们有所了解;换句话说,一个人必须珍视历史,至少珍视其共和国的历史。罗马人即是如此;至少从共和国中期(大约公元前300年)以来,罗马城里充斥着大量纪念历史人物和国家内政外交事务的各种纪念碑。历史的重要性在文学中也有所反映。罗马早期史诗(大约公元前200年)的主题是罗马历史,有的是特定事件,如第一次布匿战争(*Naevius*)、有的是关于罗马整体发展的历史(*Ennius*)。与此同时,历史学形成,并确立了自己最重要的书写类型——散文,散文形式不断发展,在萨卢斯特(*Sallust*)、李维和塔西陀的作品中达到顶峰。哲学反倒是后来者,而且其主要支持者都是散文学家。西塞罗最初的作品是政治哲学,罗马共和国(*res publica*)的历史在其作品中具有恒久的重要性。因此,历史体现在罗马人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

这一点需要进一步说明。和黄教授一样,迄今为止,我已经粗略的描述了历史在古代中国、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地位。然而,这样的描述只能到此为止:要想更深入的认识历史在三种文化中的角色,我们必须以一种更具体的方式描述事物。这有可能通过下面的方式加以实现,即询问历史学家的社会地位及其作品被创作和解读的制度背景。这些问题的答案将导出一个初步的,却清晰的类型学。

中国的历史写作从一开始即与国家官僚机构中的一个特殊位置紧密相连:史官,通常它被称为“书记员”或“编史者”。史官的最初功能是记录仪式上射箭比赛的结果。然而,不久他还兼具其他职能:观测历法和制定吉日与凶日;记录甲骨占卜的结果;颁布官方法令并将之存档;编年记录重要的政治事件,首先是时任君主的一言一行。在所有任务中,最持久的特点似乎一直是忠实记录发生的事件。这一职位的史学功能逐渐被人们认识,至少早至孔子时代,其理想就是刚正不阿的记录和评价历史事件和人物,为达此目的,史官要不畏身体伤害甚至牺牲生命。因此,中国古代的历史学家恰恰是居于政治权力中心的颇有声望的人士。而且,中国史学家笔下的制度框架与之相辅相成,因为它们承载着政治使命。^①

希腊是另外一种情况。希罗多德、修昔底德、色诺芬和波利比乌斯,仅提到的这几位最著名的历史学家,都属于社会上层。然而同时,他们每一个人都因为某方面的原因被流放

① 我知道,尽管司马迁及其父身为太史公,但作为个人,他们的著作不是在担任太史公时期撰写的。然而,这与中国文化中历史学家所处角色的主要观点不相矛盾。司马迁及其父的情况是特例,这无损于他们的个人声望以及后世读者。

在外。社会出身、财富和个人品质,使他们在流放地受到人们一定程度的尊重。他们是体面的外来者,居住在离其祖国或近或远的地方,这种特殊境遇是激励他们独立判断和拓宽历史学道路的一笔很好的财富,但这也是他们作为个体公民,或甚至是希腊世界上层正在形成的知识分子实体的一个自由流动的个体来写作的。他们不能也不期待通过其史学著作发挥具体的政治影响力。

最后我们看一下罗马,它处于一种中间状态。从较早开始,罗马就有大祭司长编年史(the annals of the Pontifex Maximus),这是简要记录重要的宗教和政治事件的官方档案。然而,更详细描述历史事件的第一批作者不是以官员的身份写作,而是——和他们的希腊先辈一样——作为个体撰写著作。但实际上,他们所有人都是身居官位的贵族,他们认为,历史写作是其公民活动的延续,只是方式不同。其著作只涉及罗马历史,受众主要是和他们同一阶层的贵族,他们希望对贵族的政治和道德行为施加影响力。他们之所以有可能在这方面发挥实际的影响力,是因为,罗马的政治阶层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据几个世纪内他们个人及其家族对罗马国家做出的贡献——也即在历史的层面来理解(并评价)自身的。

因此,对于历史思维和历史学在古代中国和古代希腊—罗马中的重要性问题,我们看到了黄教授看到的不同,但是这种不同更多的体现在中国和希腊中间,而不是中国和罗马之间。

黄教授文中关注的第二个问题是,历史在中国文化中发挥巨大影响力的方式,或者更准确的说,它必须提供的特定种类的导向问题。黄教授在文章中指出,历史思维和历史学在中国最重要的功能是提供道德导向。这一转变过程不是简单发生的,这即黄教授所谓的特殊类型的诠释周期:历史学家从历史本身获得解释和判断历史的原则,现在情况依然如此。关键的原则是道或礼,它存在于历史内部并被从中汲取出来,它首先是道德原则,历史学家据此承认善恶的本能价值,然后“‘抑恶扬善’和制定本真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是本能的和普世的,不以发生的实际后果为转移”(第182页)。当下,我们可能应该明白中国不同于西方历史思维的独特性了。现在,“自由品质”(Wertfreiheit)通常被视为(西方)专业历史研究的一个品质标志,而这一理想似乎在当时已经存在。

但是让我们从西方古典学者的角度再来看一看,事物是如何自我呈现的。就已经提到的中国方面来说,如果我们从司马迁的角度看的话,道德导向和智力洞察力是以某种特殊形式结合在一起的,我们期待的不是严格矛盾因素下的简单对立而是双方相似因素的不同组合和强化。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和西方世界的诸多不同,甚至是西方世界内部存在的不同。

修昔底德,一个完全专注于认知领域的历史学家,也就是说,他希望给读者提供认知原则的智力洞察力,用以指导人类本性然后是政治学和政治史的运作,而不是提供道德导向。在这个及其他方面,修昔底德通常被视为现代(西方)史学家的前辈典范。

但是修昔底德不是希腊历史学的全部,希罗多德、色诺芬、甚至是波利比乌斯的情况则与之不同。可以肯定的是,希罗多德感兴趣的是历史的因果关系,正如他在导论性评论的最后一部分所表明的^①,但是如果人们阅读他的著作,会清楚看到,他给读者描述了善恶模

① I, 1.1. 在此处,他宣布他的主题之一是回答这个问题,即“战争双方发动战争的原因(如希腊人和野蛮人)”。

式,而这也是道德导向。对更为传统的色诺芬来说,毫无疑问,道德导向是其历史和准历史著作的一个主要目的,甚至波利比乌斯的情况也是如此,可能他是希腊后期最接近修昔底德的历史学家,他全心洞察所描述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明确宣布道德教诲是历史的一项任务。^①

道德动力在罗马历史学中更加重要。从公元前2世纪后期开始,探查因果关系——部分可能是受希腊影响——就成为罗马历史学家的一个公认目标。^②但是他们更注重作品的道德影响力;萨卢斯特将历史记忆归结为,利用祖先的死亡面纱达到教育和激励的效果。李维在著作序言中向读者谈到了历史中要引以为戒的案例(apotreptic and protreptic examples);塔西陀明确提到“其编年史的显著任务”是抑恶扬善。

因此,中西方的历史学之间似乎又一次存在明显的对立(这是规范与认知的不同),但仔细观察会发现,它们不过是同一个脚手架的两端,具有相同的基本因素,只是结合或强调的因素不同而已。在这种情况下,如上面看到的,罗马的境况,相较于希腊而言,更接近中国。

这些观察和黄教授文中的第三个观点有关,即历史讨论中具体实例和抽象规律的作用。据黄教授所说,西方历史思维重视抽象规律,具体案例“仅仅是可有可无的装饰性”“说明”(第187页)。中国的情况正好相反,因为“当观念从特定的范例中抽离出来以后,观念就瓦解了”(第187页)。

吕森在其评论文章中提到了这一点并予以反驳。他认为,黄教授特指的仅仅是“历史中案例意义生成的逻辑”,“包括西方在内的许多其他文化中同样都可以看到这种逻辑”(第190页)。因此,“这不是用案例模式反对另一个模式的问题,关键是这种模式的说明”(第191页)。和吕森一样,我也倾向认为,“案例意义生成”的这两种模式之间存在差异,但这种差异是和历史学中的认知与规范功能之间的不同联系在一起的。这种差异可能有助于理解黄教授文中的第三个观点,以及检验这一观点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应用于中国与希腊和罗马的历史学比较。

我认为,应该把“案例或实例”意义上的“案例”与“模范或典范”式的“案例”区分开来。历史学家可以从上述任何一种“案例”角度描述事件。如果将事件视为“案例或实例”,他们通常将从中抽取出自然法意义上的一般规律。如果视事件为“模范或典范”,他们通常将很乐意从中找出道德标准意义上的一般规律。因此,人们可以说,第一类案例是“认知”史学的目标,而第二类案例是“规范”史学的目标。

在我看来,中国的历史思维似乎更多地将事件视为第二类案例。这正是在中国的历史思维中一般规律不能代替具体案例的原因所在,这也正是黄教授所强调的。一旦从案例中抽象得出一般规律,那“案例”或“实例”就可有可无了。反之,“模范”或“典范”式的案例,只有在具体的个体基础上才能发挥它的情感作用,正因如此,它不能被一般性标准废除和取代。按此理解的话,至少就中国的情况而言,黄教授文章的第三个观点是有道理的。

但事实是,我们这里是否真有一个不同的西方历史思维存在?至少对于古代来说,这一

① I, 1.2.

② 据我们所知,最早明确表述相关思想的历史学家是塞普罗尼乌斯·阿塞利奥(Sempronius Asellio)。

问题的答案将是肯定与否定兼而有之,这类似于我们对史学的认知和规范功能的观察结果。

如果有一个历史学家能被公认为第一类“案例意义生成”模式的代表,那他肯定是修昔底德。在其著作中,波罗奔尼撒战争被当作这样的—个案例进行研究,其研究的目的是结果是洞察人类政治活动的一般规律。^①即使伯里克利(Pericles)都只是修昔底德著作中的个案,而非效仿的榜样,和著作中的其他主角相比,修昔底德似乎更尊敬伯里克利的政治洞察力和个人能力。至于其他历史学家,情况就并非如此了。波利比乌斯和修昔底德很像,他经常强调因果分析的必要性,认为这是从历史吸取教训的前提,但即便如此,他也认为,在涉及榜样式名人时,公正的赞美和批判是历史学的重要任务之一。^②

在罗马历史学中,“案例意义生成”也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模式。历史学家认为能够通过历史事件探寻历史的因果律。但是在历史学家看来,个人和政体的道德品质决定着历史进程的发展,因此史学的认知和规范功能是不可分割的。相应地,萨卢斯特、李维和塔西陀都曾或多或少的公开谈到,描述引以为戒的案例是历史学家的使命之一。他们的著作确实给身为政治演员的读者提供了自身行事时可资效仿或引以为戒的案例。

在希腊和罗马的修辞理论中,对待案例的态度是不同的,这表明希腊和罗马的历史思维方式之间存在着一般性的区别。正如上文令人信服的事实表明,希腊的修辞理论更多是从智力解释的目的使用范例(paradeigma),而罗马的修辞理论特别从情感诉求的角度使用典范(exemplum)——特别是历史典范。相应地,选择正确范例(paradeigma)的决定性标准是相似的,而选择正确的典范的决定性标准是权威的,或更通常上是情感的力量。总之,从这个角度来说,罗马的情况又一次接近中国,而不同于希腊。

总结如下:黄教授的文章从中西对立的角度出发。作为第一步,这是好的,大家多少会赞同他的观点。然而,作为第二步,就需要进一步考察和细化。至少对古代而言,有两点相关内容需要探讨。第一,人们应该区分希腊和罗马之间的不同,因为历史思维的重要性及其模式在两种文化中的表现非常不同。令人吃惊的是,这些不同却是罗马和中国彼此接近的地方,在一些方面,二者的相似程度远远大于它们与希腊的相似性。这引发有趣的问题——本文不涉及与此——政治结构和史学思维的相关性问题,因为,中国和罗马(统一的大帝国)与希腊(大量城邦)之间,如果在这个角度进行对比的话,也存在相似的问题。第二点且更普遍的是,以上分析似乎证明了运用“相似因素——不同的重点和组合”模式的正确,这种模式最近受到学者们的重视。这种模式表明,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似与差异同等重要。即相互理解,包括承认差异性,有时候并非如表面看上去的那样糟糕。总之,跨文化对话依然有径可循。

(作者 F. -H. 穆奇勒,德国德累斯顿技术大学教授;译者李桂芝)

(责任编辑:姜 芃)

(责任校对:李桂芝)

① 人们通常认为,修昔底德著作中采用的讲故事的方式与同时代医学研究的方法非常相似。

② 参见,例如 10. 21,在此处,他认为历史学家和传记作者的任务是不同的。